

《神农书系》主编：温铁军 孔祥智



Shennong
Series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 理论与实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04CJY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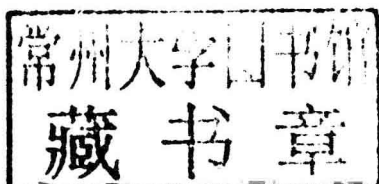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70603030）

朱信凯 ■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F723.8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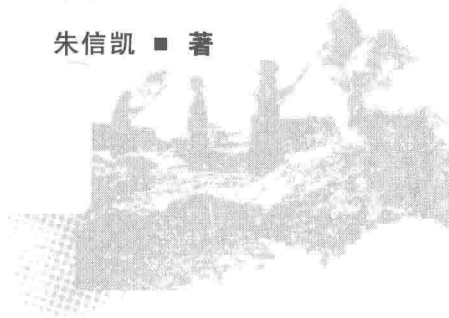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 理论与实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04CJY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70603030)

中国农业出版社
北京

朱信凯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理论与实践 / 朱信凯著.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4

ISBN 978-7-109-13727-1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农村市场—研究—中国
IV. F7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4918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颜景辰 刘 玮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4.7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42.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 / / Shennong Series

科学研究与问题意识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随自身科研竞争力的提高，从建院第5年之2009年起资助本院教师科研成果出版，是为神农书系。本文针对学术界之时弊而作，引为总序。

一、问题：关于科学的问题意识

1. 科学不必“实技求术”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时候，我被公派到美国学习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①。第一次上课，教师就先质疑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什么是科学成果？按照自然科学领域公认的实验程序简而言之——只有在给定条件下沿着某个技术路线得出的结果可被后人重复得出，才是科学成果。

亦即，任何后来者在对前人研究的背景条件有比较充分了解的情况

^① 我是1987年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被上级公派去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980—2000年的20年里先后3次去了以方法论见长的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ICPSR进修学习）；后续培训则是在世界银行总部直接操作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制度转轨的援助项目；随后，即被安排在中国政府承接世界银行首次对华政策性贷款的工作班子里，从事“监测评估”和应对世界银行组织的国外专家每年两次的项目考察评估；这就使我在1980—1990年的农口部门有了直接对话世界银行从发达国家聘请的经济专家和从事较高层次的涉外研究项目的机会，因此，当年被人戏称为农村政策领域中的“洋务派”。此外，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介入了第一个专业的“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早期研究，1988年参与了“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的民间创办，1990—1992年实际主持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创办和科研工作；还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直接操作过以全国城乡为总体的抽样调查，后来在农业部负责过多个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以县级为总体的抽样框设计和调查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参与了很多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立项评估或结项评审。因此，本文实属有感而发，目的在于立此存照。

下，假如还能沿着其既定的技术路线重复得出与前人同样的结果；那么，这个前人的研究，应该是被承认为科学的研究……如此看来，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科学成果，都因后人难以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重复得出与前人同样的结果，而难以被承认为科学！？由此，无论东西方的研究只能转化为对某种或者某些特定经验归纳出的解释性的话语。

由于这些话语的适用性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有限，因此，越是无法还原那个时空条件的研究，就越是体现了人们追求书斋学术的“片面的深刻”的偏执。

也许，除了那些“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因内在地具有政治正确而不应该列入科学性讨论之外，人类文明史上还不可能找到具有普遍意义或者普世价值的社会科学成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的科学化虽然在提法上正确，但在比较浮躁的意识形态化的氛围之中，却可能成为普遍化的学术造假的内在动因。因为，很多以“定量分析”为名的课题研究尽管耗资购买模型而且有精确的计算，却由于既缺乏“背景分析”，也没有必须的“技术报告”，而既难以评估，也难以建立统一标准的数据库。更有甚者，有些科研课题甚至连做研究最起码的“基本假设”都提不出来，有些自诩为重大创新的、经院式的理论成果，却需要进一步讨论其理论逻辑与历史起点是否吻合等基本常识……

这些实际上与科学化背道而驰的缺憾，往往使得后人不能了解这种大量开展的课题研究的真实依据。如果科研人员不知道量化分析的基本功，不了解数据采集、编码和再整理、概念重新界定等各个具体操作环节的实际“误差”，就很难保证对该课题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评价。对此，国内外研究方法论的学者多有自省和批评。

再者，由于很多课题结题时没有明确要求提供受国家基金资助所采集的基础数据和模型，不仅客观上出现把国家资金形成的公共财产变成“私人物品”的问题，而且后来者也无法检验该课题是否真实可靠。

何况，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作为两种分析方法，本来不是对立的，更没有必要人为地划线界定，非要偏向某个方面才能证明研究课题的科学性。

可见，科学研究还是得实事求是地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必



刻意地“实技求术”，甚至以术代学。方法无优劣，庸人自扰之。如果当代学者的研究仍然不能具备起码的科学常识——理论逻辑的起点与历史经验的起点相一致，则难免在皓首穷经地执着于所谓普遍真理的进程中跌入谬误的陷阱！

2. 农经研究尤须分类

如果说，早期对不同方法的学习和实践仅形成了对“术”的分析；那么，后来得到更多条件从事大量的与“三农”发展有关的国际比较研究之后所形成的认识，就逐渐上升到了“学”的层次。诚然，面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农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徘徊的困局，任何人都会学看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但却几乎很少人能看到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教训。

我们不妨从农经研究的基本常识说起——

如果不讨论未涉及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由于农业自身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使其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文明史中没有被根除，因此，工业化条件下的世界农业发展分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一是前殖民地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因殖民化造成资源丰富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二是前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资源有限，只能实现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因此，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高度相关的绿色运动从欧洲兴起。

三是以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居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由此看来，中国属于何者，应该借鉴何种模式，本来也是常识问题。如果做得到“去意识形态化”讨论，那就会愿意借鉴本文作者更具

有挑战性的两个观点：

其一，依据这三种类型之中任何一种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都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

其二，这三种类型之中，也都没有形成足以支撑“农业现代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功典范^①。

中国之于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方面是那时候在发展模式上全面学习苏联，并为此构建了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迫于城市工业部门已经制造出来的大量工业产品急需借助国家权力下乡的压力——如果不能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中国人改革之前30年的国家工业化是难以通过从三农获取原始积累来完成的。

时至今日，虽然半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找到几个投入产出合理的农业现代化典型，人们却还是在不断的教训之中继续着50多年来对这个照搬于先苏后美的教条化目标的执着，继续着对继承了殖民地资源扩张遗产的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经验明显有悖常识的片面性认识。

显然，这绝对不仅仅是农经理论裹足不前的悲哀。

二、学科基础建设只能实事求是^②

以上问题，可能是国家资助大量研究而成果却难以转化为宏观政策依据、更难以真正实现中国话语权及学术研究走向国际性的内在原因。甚至，令学术界致毁的、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真正严肃的学术空气缺乏，也使得这种科研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为各个学科“小圈子”内部分配——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几乎难以避免地导致当今风行的学术

① 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一版。

② 2004年暑假，当以53岁高龄被“引进”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之职的时候，曾经有两种选择：其一是随波逐流、颐养天年；其二是最后一搏、力振科研。本能告诉我，只能选择前者；良知却迫使我选择了后者。执鞭至今五年有余。在校领导大力支持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本院借国家关注“三农”之机，一跃成为全校最有竞争力的院系之一：教师人均国家级纵向课题1.5个，人均课题经费30万；博士点从1.5增加到4.5个，还新组建了乡村建设中心、合作社研究院、可持续高等研究院、农村金融研究所等4个校属二级科研教学机构。其间，我虽然了解情况仍然不够全面，但对于现行教育体制问题的认识还算比较新鲜；再者，在这几十年来的“三农”研究中，有很多机会在国外著名高校学习交流，或在几十个国家的农村进行考察，也算有条件做些比较分析。于是，便就科研进一步服务于我国“三农”问题的需求提出这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



造假和教育腐败。

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实事求是地抓好基础建设。

首先是清晰我们的问题意识，从本土问题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敢于挑战没有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理论观点。当然，一方面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化的讨论；另一方面，尤须警惕海内外任何具有意识形态化内涵的话语权争论被学术包装成科研成果；尤其是那些被广泛推介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在农经界，主要是力戒邯郸学步和以术代学等多年来形成的恶劣学风的影响。

其次是改进定量研究。如果我们确实打算“认真”地承认任何一种新兴交叉科学在基础理论上的不足本身就是常态，那么对于新兴学科而言，最好的基本研究方法，其实恰恰是“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试验研究和新兴起的文化人类学的参与式的直接观察，辅之以采集数据做定量分析。同时，加强深入基层的科学试验和对个案的跟踪观察。近年来，国外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讨论，已经不拘泥于老的争论，开始从一般的“个案研究”演变为资料相对完整、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故事研究”。我们应该在现阶段仍然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并重的原则，至少应该把参与式的试验研究和对不同个案的实地观察形成记录，都作为与定量分析同等重要的科学方法予以强调。否则，那些具有吃苦耐劳精神、深入基层从事调查研究的学者会越来越少。

再次是改进科研评价体系。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应该修改开题和结题要求，把支持科研的经费综合统筹，从撒胡椒面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建立能够容纳所有国家资助课题的数据库和模型的共享数据系统，从而，对研究人员的非商业需求免费开放（个别需要保密的应该在开题前申明），以真正促进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繁荣；同时，要求所有课题报告必须提交能够说明研究过程的所有环节出现的失误或偏差的“技术报告”（隐瞒不报者应该处罚）；要求任何重大观点或所谓理论“创新”，都必须提供比较全面的相关背景分析。

既然中国人的实事求是传统被确立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那就从我做起吧。

（2009年国庆中秋双节于北京后沙峪）



摘要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及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领域，2011年中央1号文件又将目标锁定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从供给约束转化为需求约束，尤其是在当前通货紧缩、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而持久的原动力的观点已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关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就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消费经济学与农村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扩大农民消费不仅可以有效化解和消除当前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生活质量，是一项“四两拨千斤”的政策选择，是当前处于经济转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是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本书所做研究就是基于此而展开的。

本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①以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但以西方经济学为主的双重视角来研究消费问题；②以微观消费与宏观消费问题相结合，从微观消费入手，落脚于宏观消费政策的取向。本书关于消费问题研究的基本观点是：研究消费者决策和消费者行为要为研究宏观消费问题服务；宏观消费的研究要以消费者决策和消费者行为研究为基础；③理性消费者将追求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本书对农民消费者行为的理解不仅包括农民的消费决策，还包括农民的储蓄、投资、信贷、劳动供给决策。后者不仅影响消费决策，而且将与消费决策一起对总需求、产业结构演变、产业发展等宏观经济现象作出解释。

本书共包含六章内容，按照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函数—消费行为—消费政策的逻辑思路展开。本书采用经验归纳和理论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辅之以计量分析与统计检验。翔实的第一手数据使此次研究更符合实际，结论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第一章主要对消费函数的理论变迁做了细致的文献梳理，为农民消费行为分析构建了良好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章是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总论，主要从农村消费市场、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



结构、农户消费函数及农民耐用品消费潜力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消费进行描述性分析。第三章以 2009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探求农民消费、生产投入与资产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机制。第四章是流动性约束与农民消费行为，探讨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环境下的农民消费信贷选择的边界与行为。第五章是社会流动与农民消费行为，从社会流动性障碍角度分析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第六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提出了扩大农民消费的政策思路与建议。

本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我们给出了以下政策实施要点：

作为现行制度框架内的技术层面政策措施实施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农村消费环境，从而为启动市场所需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创新提供背景与平台。

◆ 在传统的集贸、批发和零售等营销渠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以现代连锁经营为代表的适应农村市场的营销网络，促进现代消费方式、流通模式和市场经营机制向农村渗透。

◆ 结合农村市场的消费特点，广泛开展行之有效的促销活动，完善售后服务体系，坚决制止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使农村居民消费放心和舒心。

◆ 加强对农村消费市场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农村需求和农民消费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重点开发和生产适合农村和农民消费需求的物美价廉的产品。

◆ 建立严格的农村商品准入制度，从源头堵住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农村市场的渠道，严厉打击与农业生产资料及农民生活消费资料相关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

◆ 在农村设立消费者投诉站，并对农民进行相关教育，培养其维权意识，特别注意保障农民的消费安全。

◆ 财政政策的重点应由城市转向农村，应以新农村建设为突破口，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等手段，更大规模地开展以公路、电网、供排水、通信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 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开拓农村市场，生产具有农村特色的产品。要通过生产适合于农村家庭使用的耐用消费品，以及为这些家庭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提供帮助，使低收入阶层也能享受到“新消费方式”的乐趣。

◆ 政府通过投融资机构（政策性银行）对农民生活资料及农业生产资料相关产业给予资金支持和利率优惠。

◆ 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采取整村推进、异地搬迁、劳务输出、社会救助等多种方式，着力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性消费问题。

制度创新与变迁是一场渐进式改革，其主旨是建立新的制度规则，促进经济发展。农村消费市场的制度创新应首先从选择降低风险的制度入手；其次，应通过制度安排逐步消除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

◆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 破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形成良性循环的农民收入结构。

◆ 理顺农村消费品价格机制，疏通商品流通渠道，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 创建政策性国家农业保险公司，提高农民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农民收入波动，稳定消费预期。

◆ 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规范和引导合作金融发展，积极探索土地金融制度。

◆ 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对保障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保障农民土地权利，逐步建立农村土地金融制度。

◆ 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步伐，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①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周期的波动、通货膨胀等因素对农民消费—收入关系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有关系。②在调研数据的样本选择上，东部省份的数据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结果产生了影响。③关于农民储蓄及投资等问题，虽有涉及，但并没有深入展开研究，而这对于农民消费来讲，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以后进一步的教学及科研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未展开研究或被忽视的领域，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积累相关的数据资料，积极争取课题支撑，继续深化关于农民消费问题的研究。



目 录

总序

摘要

第一章 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	1
第一节 经验研究——理论变革的动力	2
第二节 不确定性——活水之源	6
第三节 由微观到宏观——难以跨越的鸿沟	9
第四节 理论移植——经典理论的水土不服	13
第五节 几个认识论问题	17
第二章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总论	19
第一节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	19
第二节 农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38
第三节 中国农户消费函数	69
第四节 耐用消费品消费	77
第三章 农民消费、投入与资产：因素分析	95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95
第二节 生活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113
第三节 资产影响因素分析	117
第四章 流动性约束与农民消费	120
第一节 理论解释与概念说明	120
第二节 正规金融与农民消费信贷——合会产生的制度基础	122

第三节	非正规金融与农民消费信贷——对轮会的分析	126
第四节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共存下的农民消费信贷选择	135
第五节	非正规金融缓解农民信贷约束的实证分析	137
第六节	本章小结与数学说明	145
第五章	社会流动与农民消费	149
第一节	社会流动与农民消费结构	150
第二节	社会流动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155
第三节	社会流动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159
第四节	社会流动性约束因素分析	163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169
第一节	基于消费函数理论的农村消费政策导向	169
第二节	农民可持续消费及评价	174
第三节	农民消费结构合理化及评价	186
第四节	扩大农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196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17



第一章 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 一个文献综述

消费函数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概念之一。由于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传统消费经济理论与西方消费经济理论的异源性差异，当前我国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本章以消费函数为主线，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旨在系统梳理消费函数研究的理论变迁及内在逻辑，分析消费函数研究由微观主体过渡到宏观数据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重大分歧，以及理论移植到我国需要解决的适用性问题。基于文献评述，本章最后提出了我国消费经济研究的几个认识论问题。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消费函数研究经历了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的变迁，消费的决定因素由具体的现期收入、过去收入丰富为抽象的总收入、持久收入以及各种收入的组合，消费者面临的约束由简单的预算约束过渡到资本市场弱势有效条件下的流动性约束，而消费者行为由完全理性合理化为理性预期，并据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

自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提出以来，消费函数在宏观经济中便占据了重要地位。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核心，至今仍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架马车；储蓄是资本形成和财富积累的基础，而资本是基本生产要素，财富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微观主体对消费和储蓄的选择，是宏观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基础，研究微观主体行为可以有效地了解其决策变量及特点，进而对政府的政策导向具有指导意义。继凯恩斯理论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失败之后，生命周期理论又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储蓄，认为储蓄与经济和人口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发达国家对储蓄率长期低下的担忧也使这一问题在宏观领域经常被提及。由此可见，消费和储蓄是经济繁荣、资本积累和财富形成的核心变量，因而消费函数理论对指导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本章内容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梳理了消费函数研究由始至今的理论变迁及其内在逻辑。经验研究在理论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据质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是制约理论发展的一大瓶颈，而随着这两者的进步，旧理论不断被否定，更符合

现实的新理论应运而生，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紧密结合是消费函数研究的重要趋势和特点。第二部分分析了由微观主体过渡到宏观数据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重大分歧。研究选择的基本单位、加总过程中对人口统计特征的处理、政府行为的影响以及消费时机的选择等问题都是分歧产生的重要因素，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对理论完全相反的认识。第三部分详述了理论移植到我国需要解决的适用性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够稳定、政策调控力度大等都将引起经典理论的“水土不服”，而我国理论界又有一种对经典理论套用和检验的倾向，因此，如何建立适用于我国基本国情的消费函数理论框架就成为摆在经济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第四部分提出了基于中国国情消费函数研究的几个认识论问题。

第一节

经验研究——理论变革的动力

在消费函数理论的演变中，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扮演了重要角色。绝对收入理论由于无法解释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性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相对收入理论虽然通过引入“过去收入”而极大地拓展了研究思路，但却始终不能严格地解释这个现象。直到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的诞生，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性才得到了完美的解释。然而伴随着旧问题的解决，新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持久收入理论关于消费与滞后收入无关的推论遭到了经验研究的猛烈攻击，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在很多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消费一年龄曲线的弓形性也无法从数据中得到有力的支持。直至现在这两个理论仍在众多的质疑声中举步维艰，尽管谁也不会否认它们的确是消费函数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随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到来和动态规划方法的提出，经济学家开始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消费者行为，预防性储蓄成为解释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窘境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习惯、文化等行为经济学理念也强势进入研究视线。当下，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存在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那就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常常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经验研究可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而如何来检验经验研究的合理性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终极正确的方法可能本来就不是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理论和方法的改变也本来就是环境改变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一、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理论

在凯恩斯创造性地引入“收入”变量之前，人们对于消费和储蓄的认识更多停留在利率的决定性作用上。随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主导地位的确立，消费被看作是决定总量需求的主要因素，而过度的储蓄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成为经济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停滞的主要根源——这种由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对储蓄的恐惧甚至一直持续到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凯恩斯认为，收入的增加会以一定的比例转化为消费，而这个比例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即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正是这一“基本心理定律”，使得储蓄的增加及有效需求的不足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尽管形式非常简单，却并不妨碍绝对收入理论成为消费函数研究的开山之作：模型首次将收入引入对消费的研究，从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占据着相关研究的核心地位，改变的只是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及所面临的约束等问题。它能够很好地解释大萧条的产生，遗憾的是囿于研究数据不足而无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直到库兹涅茨（1942）对美国1879—1888年及1929—1938年两阶段国民生产和资本净积累的研究结果发布，人们才发现储蓄率并没有像绝对收入理论预测的那样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反而表现出明显的长期稳定性。此外，凯恩斯主义对大萧条之后就业与收入的预测也出现了严重偏差。至此，对经济大萧条有相当解释能力的绝对收入理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这是经验研究第一次推动理论变革。

顺应理论变革的需要，杜生贝（Duesenberry, 1949）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 1949）分别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们将“过去收入”引入消费函数，认为消费与收入的比值遵循一定的函数关系。尽管两人的模型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证明了一个事实——消费收入比不会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仅与现期收入和历史收入峰值的比有关。他们对此解释为“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效应（Everett E. Hagen, 1955），即当收入发生改变时，消费者并不倾向于马上改变自己的消费水平，也即消费“黏性”。然而即使消费确实存在黏性，仍不能完美地解释库兹涅茨的储蓄率长期稳定性，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研究所选择的时间区间不同（杜生贝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29—1940年，而莫迪利安尼为1921—1940年），二人的参数估计结果有显著的差异，这也为方法的可靠性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相对收入理论的解释能力有限，但与绝对收入理论相比显然有很大的进步，至少它开始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分析问题。

二、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

由于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消费函数的经验研究一度陷入混乱。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增加变量数量；还有一部分学者在模型中增添不同性质的变量，如人口因素等。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学家才为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性建立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生命周期理论。理论认为代表性消费者在其拥有的总资源约束下追求一生消费的平滑，工作时进行储蓄，退休后则负储蓄。消费—年龄曲线的位置取决于其一生拥有的总资源，形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时间偏好率及利率的关系，与各期收入无关。

至此，消费函数研究的着眼点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由信奉绝对收入理论的消费至上，转而关注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莫迪利安尼认为国民储蓄是资本供给的来源，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故而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是经济学的中心课题，而极为讽刺的是人们对储蓄问题的关注却源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在所有的消费者行为模型中，只有生命周期模型指出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较高的储蓄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Deaton, 1992）。从生命周期模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令人惊讶的结论：一国的储蓄率与人均收入无关，而与其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故而稳定增长的经济体将拥有稳定的储蓄率；国民储蓄率不单是公民节约行为差异的结果，不同的国民储蓄率实际上可以用同一个消费者的行为去解释；对于一定的经济增长，控制财富—收入比和储蓄率的主要参数是退休期的长短（Modigliani, 1986）。

持久收入理论（PIH）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它认为收入可以被分解为平均或预期的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而消费由持久收入决定，不会对收入的短期变动有较大的反应，消费比收入更平滑（Friedman, 1957）。跨期的持久收入与宏观数据在统计层面是具有一致性的，那么消费与持久收入在长期中成比例就顺理成章了。如果将持久收入理解为消费者一生拥有总资源的年金，那么它将与生命周期理论非常相似，如消费—年龄曲线是弓形的以及消费与收入滞后信息无关等。但二者的研究重点差别很大，生命周期理论的精髓在于可以专注于研究生命特征变化引起的“急需”（Modigliani, 1986），而持久收入理论几乎不关注人口特征的变化对消费—收入关系的影响或者从宏观出发的人口、收入和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它更关注消费的动态行为，尤其是超越了短期行为的消费—收入动态关系。由于二者在许多推论上有一致性，常被结合在一起讨论。

相对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所得的“强推论”而言，理论本身显得过于笼统，更像是一个研究框架，缺少经得住实证检验的模型，因此招致了经验研究的许多